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十八）

江燦騰

4. 臺灣教派大分裂後的再分裂與全島佛教組織的重整

（1）從臺南開元寺內部的再分裂看臺日佛教「聯絡」的兩難困境

但此事客觀來說，其實涉及到如何兼顧「日臺佛教必須朝向同化」與「臺灣本土佛教主體性必須維護」的兩難。這也是殖民地宗教常會遭遇的抉擇困境。

況且事實上臺南開元寺與臺南天后宮，早在清代興建之初，就具有改朝易代後新中央權力布達或鎮服新領地臺民生活圈的濃厚政治意味在。而在歷經有清一代200餘年長期直接統治以後，代表前清官方正統宗教與祭祀威權的象徵意義，更已深入當地民眾與寺僧的文化積澱中，幾乎與革命者所服膺與信誓旦旦的「意識型態」沒有太大差別。

故日治以後，日僧在該寺中的大殿新供奉

「今上」大正天皇的「御金牌」一基，或許可以接受——因實際上也已是殖民統治的終極政治權威；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臨濟宗原本又傳自中國大陸，恰巧陳傳芳本身又是長期在福建鼓山湧泉寺、怡山長慶寺接受臨濟法脈與叢林制度的薰陶，故特別堅持此一法統的延續性。例如在他生前所訂的〈開元寺例規〉第4條即提到：

任職要具備左（下）記各項資格方為合格。

1. 通曉佛教宗旨，行解相應，兼備有學識者。

2. 有德望，能說法開導後學者。

3. 傳芳和尚之法類者。¹

第5條提到：

本寺之執事，以本寺在住之僧侶及傳芳和尚之法類，並經本寺執事3年以上者選任之。²

從畫線的部份，即知開元寺的新僧職，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屬於「傳芳和尚的法類」，其他非此

系者，便被排除在外了。

但是，其中亦帶有陳傳芳個人的私心和對先前其徒蔡玄精遭放逐之事挾怨報復之意。例如他和鄭成圓接掌臺南開元寺之後，雖一面舉辦傳戒大會，端正寺中僧徒的不良習氣；同時也設法改投臨濟宗妙心寺派，另謀發展。

但他一手拉拔的繼承人鄭成圓本身行為就是問題的。例如在《臺南新報》上，即曾有一篇〈逐歸賊禿〉的長文報導，前面的一段，便是關於此段複雜內情的揭露，茲轉錄如下：

鄭從興（成圓），北之基隆人。父某，出家於福建鼓山，頗守法規，對於人生觀淡如也，且欲其子同歸不二法門。鄭7、8歲時，亦攜去為沙泥，未數月，某忽得疾日益危。彌留之際，即託孤於其師傳芳。傳芳本臺南人，深憐之，教之課誦，名之曰成圓。及弱冠，傳芳攜之歸臺，駐錫開元寺。越數年，傳芳果證涅槃，成圓承其住職，時年未及壯也。色界之天不能即破，拐帶人家侍妾以去，逃之南洋。故諺有之曰：賊心和尚。誰知我佛有靈，則於冥冥之中譴責之。所得非義之財約6、7千金，盡喪於商場中，乃嗒然返，寄跡鷺江，與諸無賴遊，討生活於賭博場裡。去歲冬間，餬口計窮，乃

謀其徒黨，截劫一支那人。案發，廈門領事派警察押解還臺，限以3年期，禁其不准重踏是地也。

當成圓在寺，曾收一徒曰詮淨，現任副監院。今聞其師犯案逐歸，意欲招之，相助為理，寺中眾僧極力反對。蓋以成圓既犯貪財、癡、殺、盜、淫十惡，何可使之復來，污穢清淨之地乎？況開元寺為鄭延平，北郭園故址，蓋臺南名勝推為第一，亦斷不容此賊禿，為臺南人士羞，故必深惡而痛絕之。銓淨何物？安得以個人之私情，而致不顧宗教體面，不恤人言，不視管理者。而欲以無垢之山門，收容此兇惡罪犯，奚可哉、奚可哉！³

換言之，鄭成圓是在陳傳芳過世之後，即接掌該寺住持的。但他原先也是在傳芳門下，由傳芳本人親自養育和一手啟蒙他的佛教知識。

後因鄭成圓的師父蔡玄精（傳芳之徒），在明治41年（1908），因被指控有「藉妖術詐財」嫌疑，遭警察拘捕，再於隔年（1908）被放逐回大陸泉州，於是便在傳芳的授意之下，開始代理開元寺監院的職務，而此時臺南開元寺仍與日本曹洞宗保持聯絡。因此嚴格說來，蔡玄精被誣遭放逐，才是導致臺南開元寺決心脫離日本曹洞宗轉投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關鍵事件。並且在蔡玄精遭放逐之

後，日本曹洞宗一度還屬意由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江善慧來擔任住持⁴。

但此一提議立即遭到寺中管理人兼監院的鄭成圓等僧侶的抗拒。於是臺南當地的大商家首腦人物「三郊組合長」許藏春，風聞有清國籍原臺南商人出家的陳傳芳正於臺北地區弘法，便請其返臺南接開元寺住持之職；然因傳芳起初無意放棄清國籍，無法在臺出任正式的寺院住持之職⁵，故由徒孫鄭成圓掛名而實際由傳芳任住持之職⁶。

可是原先開元寺的傳統規定，非經在福建鼓山受完大戒，不能出任該寺住持之職⁷，因此，包括曾以監院兼任該寺住持，後來離寺前往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應聘住持新職的林永定，亦必須讓位給曾正式前往福建鼓山受過大戒的僧侶，但此一慣例在傳芳決定放棄清國籍時，也一併加以廢除。然後，再經與鄭成圓、沈本圓等人的商議，以及丸井圭治郎和長谷慈圓的大力鼓吹，於是才有大正6年的改宗投靠問題。不過，後遺症是如何面對日本曹洞宗的反撲舉動？⁸

反之，東海宜誠也在該寺內部收臺僧為自己的徒弟，像在《南瀛佛教》第13卷第7號，就有一則關於東海宜誠所收臺僧弟子的相關報導。而此一報

導，略去前面冗長但不相關的說明之後，有兩段文字（原為日文，筆者中譯）是這樣的：

（10）【法系】當山住職東海宜誠師（號海巖），嗣續臺北市圓山臨濟護國禪寺開山贈歷住妙心得庵玄秀大和尚之法系，為龍泉寺傳法始祖。而相續宜誠禪師法系之龍泉寺徒弟，於各地建立新寺，其初代住職正式就任者：

吳義存師 大林昭慶禪寺第一世

陳詮淨師 屏東東山禪寺第一世

賴耀禪師 北屯寶覺寺第一世

張慧光師 楊梅妙善寺第一世

（11）【法統】昭和2年3月1日，大本山妙心寺第2世圓鑑國師550年遠忌大法會之際，本派大本山管長特對現任東海宜誠師授予本山紋章金襴傳法衣，後來住職之法統，嗣當山世住職者，以正式稟承此傳法衣為其授記。⁹

其中筆者畫線的這一位，即後來擔任著名的屏東東山禪寺第一代住持的陳詮淨，正是東海宜誠原先在臺灣開元寺力挺的臺僧徒弟之一¹⁰。

相反的，在開元寺中另一極力對抗東海宜誠勢力擴張的是魏得圓（1882～1946）¹¹。不只如此，魏得圓甚至於在大正11年（1922）初，還與另一在

開元寺原已擔任副寺的陳澈淨（1887～1975）及其他原鄭成圓住持系統的僧侶激烈對抗中，接任新開元寺住持職位。至於原住持鄭成圓本人，前面已交代過：他是因先前曾犯色戒和私自挪用大筆寺款出逃南洋，被開元寺除名。可是錢花光，又在外地犯罪，被遣回臺灣，一度還浪跡在賭場討生活，但最後實在已混不下去了，便又想靠徒弟陳詮淨的幫忙，重返臺南開元寺。

由此看來，鄭成圓固然是促成和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聯絡」的功勞者之一，理應獲得東海宜誠的大力回報。

可是，他的罪行累累，也嚴重影響了寺中僧侶的團結。也許東海宜誠可以放棄鄭成圓，但若不力挺陳詮淨和陳澈淨，開元寺恐將得而復失。因此一開元寺的內部鬥爭，都和東海宜誠處在夾縫中左右為難有關，並且因而使寺中不斷的紛爭，一直延續到丸井丟官去職返回日本之後，仍未停歇¹²。

本來，臺南開元寺的改宗問題，在長谷慈圓和陳傳芳兩人未過世之前，因已曾先赴日拜會過中央主管宗教事務的岡田文部大臣、柴田宗教局長，相信彼等已確認無太大問題後，才敢在返臺後，大舉轉投臨濟宗妙心寺派的。

而臨濟宗妙心寺派為了平衡日本曹洞宗的在臺優勢，也相繼成立了「臺灣佛教道友會」，以及將原「鎮南學寮」提升層級為「鎮南學林」，以滿足臺僧和齋友子弟進「中學」讀書的意願。並且，東海宜誠一開始，就是實際負責此一事務的。照理雙方是可以有和諧共事的基礎的。但此一「鎮南學林」不久也跟着出問題。其原因為何？後文會再交代。

此處必須先就日僧東海宜誠這個人略作介紹¹³。此因日治後期的臺灣佛教，幾乎處處都會提及他的所做所為，故不能將此歷史的串場人物，完全漠視他的個人事蹟和宗教性格，甚至於他有別於其他的日僧，不但精通臺語，也決心以臺灣為永久的事業基地等，都值得一提。（未完待續）

註釋

1. 鄭卓雲手稿本，《臺南開元寺誌略稿》（臺南：開元寺，1933），頁11。
2. 同上註，頁12。
3. 轉錄《鳴鼓集》二集，頁53。
4. 據李添春說：「（靈泉寺）建大雄寶殿時，日本曹洞宗補助1萬元，這是破天荒的事，臺灣眾多的佛教徒都極羨慕，所以全省大廟古剎，都相爭請他當住持。最早是明末李茂春夢蝶圓的（臺南）法華寺，其次開元寺也曾聘請他當過住持，汐止百萬富翁蘇家所建設的靜修院，也請他為住持，由他女弟子辦理。」見李添春，〈臺灣佛教史資料——上篇曹洞宗

史》，載《臺灣佛教》25（1）：8，1971.11。但，此1萬元，應是日本曹洞宗建「臺北別院」的補助款，李添春可能張冠李戴了。見《宗報》第267號（1909.2.1），頁40。此資料由臺灣的釋慧嚴博士首先使用，其後筆者透過王見川的協助，亦取得松金公正在日影印的全套一份，特此誌謝。

5.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5月7日〈住持圓寂〉的報導。轉引王見川，〈略論日據時期的臺南開元寺（1896-1924）〉，《圓光佛學學報》第4期，頁285。

6. 事實上，鄭成圓是經過官方登記的管理人，為該寺寺產的法律代理人，本身實權原可凌駕住持之上。

7. 曾景來，《臺灣宗教之迷信陋習》（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9），頁330。

8. 這種情況，後來都分別在臺南開元寺及林永定的「大崗山派」內部，暗潮洶湧，例如魏得圓擔任住持之後，請來曾參與「文化協會」的林秋梧入寺，來共同對付東海宜誠和原鄭成圓派的僧侶；又因林秋梧敵視東海宜誠，故東海宜誠亦反對讓寺方贊助他赴日深造，可是魏得圓不但堅持到底，也導致林秋梧赴日後，不進臨濟宗辦的佛教大學，而是到曹洞宗辦的駒澤大學去追隨禪學思想家忽滑谷快天，甚至後來一度請其師忽滑谷快天來寺中，擔任「南瀛佛教會」所舉辦的禪學講習會之主講者。另一方面，非林永定系統的同門陳永達，也選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江善慧為追隨的對象，以至遭到已歸屬東海宜誠臨濟系統的林永定嫡系門下的排斥，於是在戰後轉往新興的大高雄都會區去另謀發展，而其門下釋開證便由此而開創了不同於「舊大崗山派」的「新大崗山派」，其影響力並持續迄今未衰。

9. 《南瀛佛教》第11卷第3期（1933.3），頁46。

10. 有關陳詮淨的背景，徐壽在《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一書提到：「氏臺南州北門郡人，現年41歲（1892-1932）」，少習漢學，後在當地任雜貨商管理。大正2年（1913）棄商就道，入臺南開元寺為僧，虔心研究佛學，至大正12年（1923）遂為同寺監院。後越13年（1924）渡支視

察佛教，並近玉佛十尊歸。昭和3年（1928）歷任臨濟宗妙心寺派大本山為知客、藏主、首座諸職。同年遂任屏東東山寺住持職。氏曾受臨濟宗妙心寺之表彰兩枚，亦云榮矣」。

11. 根據盧嘉興在〈北園別館與開元寺〉一文的說法是：「（得圓）字如松，俗家姓魏，嘉義縣店仔口馬稠後人，光緒8年壬午，西元1882年12月14日生，為魏繼昌的四子。光緒25年（1899）18歲皈依龍華派，31年（1905）剃度拜玄精上人師，翌年25歲往福建鼓山受比丘戒，住湧泉寺一年轉錫泉州崇福寺，宣統元年（1909）回臺住開元寺。歷任監院及臺南水仙宮、馬稠後關帝廟等住持。」盧嘉興此文刊在《古今談》雜誌第27、28期（1967.6.25）。後收在張漫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8——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佛教文化出版社，1979），頁302。

12. 因此，日治時期的臺南開元寺，從傳芳過世，到高證光（執德）接任新住持之前這段時間，即是處於魏德圓、林秋梧、鄭卓雲等陣營，強力抗拒東海宜誠、陳澈淨、陳詮淨等集團不當操控開元寺寺務與寺產的激烈紛擾局面。而高證光（執德）接任之後，所以能平息，是高本人在日本國內所受的佛學教育程度是「駒澤大學」佛學科畢業，並以師承禪學思想家忽滑谷快天的批判禪學為職志，故在專業上已高於東海宜誠一等。此外，又實際接任該寺住持職務之時，已進入日本對華全面戰爭的非常時期，臺灣佛教本身已無自主性可言，故高執德和東海宜誠此時不但沒有對抗或不和，相反的兩人還是密切合作的事業夥伴呢！怎麼可能會有衝突？只是暗潮並未真正平息，而是延至戰後爆發罷了。故高執德在戰後即因寺中對立派的檢舉，遭官方逮捕和被槍殺，可見報復之火，始終未熄。

13. 因「東海師」在臺南開元寺的負面形象，在戰後，其實是因為李筱峰教授的名著《臺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的精彩描寫，而聞名於學界的。但在李著中的「東海師」，很少有關他的背景資料，故他宛若黃俊雄布袋戲中的「藏鏡人」，聞聲而不見形影。故底下，先簡略地將其事蹟作一說明，以便於往後的相關討論。